



WENXUE LILUN TONGLUN

文学理论通论

张进 著



人民出版社



文学理论通论

张 进 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夏 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理论通论/张进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0

ISBN 978-7-01-014177-0

I. ①文… II. ①张… III. ①文学理论 IV. ①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1886 号

文学理论通论

WENXUE LILUN TONGLUN

张 进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4.25

字数:30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14177-0 定价: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自上世纪末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理论研究仿佛经历了一次哗变，整体地转向了理论的“背面”；与之联袂而行的是各种“反理论”“元理论”“非理论”“软理论”和“后理论”话语的“溜湮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钟嵘语）。这种局面似乎最终印证了长期萦绕着理论领域的“理论无用论”断言，与作为真正“批评的世纪”的上一个世纪不同的是，21世纪俨然是一个不需要任何理论的世纪，是一个拒绝文学理论的世纪。在这种语境下撰写“文学理论通论”，大约不仅显得“不合时宜”，而且似乎“不讨喜欢”。然而，撰写者却有另一番思量。

理论有其“隅隙”和“衢路”，这是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使用的理论批评术语。刘勰认为，曹丕、曹植、陆机、挚虞等人的“近代”批评著述“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缘此而造成的后果是，或“密而不周”，或“辩而无当”，或“华而疏略”，或“巧而碎乱”，或“精而少功”，或“浅而寡要”；而其他等而下之的批评家和批评著述则更是“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诂，无益后生之虑”。可以看出，刘勰拒绝“照隅隙”的批评，这种批评多囿于作家生平和作品篇章的一般论述，疏略碎乱、片面无当、少功寡要，是流于细枝末叶和表面现象的泛泛之论和“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的一隅之见；他真正追求的是“观衢路”的理论批评，这种批评寻根索源、原始要终、立论周密、逻辑谨严、功底扎实、议论精深，有益于研究的深化和问题的解决，对前人的研究也多有

祖述，对于后人的研究亦大有裨益，是对各个隅隙（包括衢路本身的阴影）的会通化解，因而也是理论批评的通途和大道。由此看来，理论的“隅隙”就是理论在具体问题上的一得之见，当然也许不乏独特解会，但在功用上却“无益后生之虑”；理论的“衢路”就是理论始终秉持的“圆照”视野和反省批判精神，是对象反思与自我反思的同时并举；是对全方位、整全性视野的不懈追求，是整体与局部之间的辩证对话，是各个“隅隙”的化域会通。“衢路”正是这样一个有利位置，诚如德里达的妙语：“如同有了新的视觉装置的辅助，人们最终可以看见视线，不仅看见自然风景、城市、桥梁和深渊，而且可以看见看本身。”当然，执于“隅隙”者却并不是没有运用理论或彻底摆脱了理论，而只是被一种或陈旧过时、或短浅褊狭的理论所掌握，陷入“理论之罔”。

或许，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理论局面，与刘勰和钟嵘所面对的有几分相像。他们遭遇了理论批评之“多”或“喧哗”，恰似我们今天所身处的“理论过剩”时代一样。但他们二人并没有采取拒绝理论批评的态度，而是积极地展开批判、解域和会通。在此过程中，刘勰和钟嵘从他们所批判的对象陆机、挚虞及其著述那里，所汲取的滋养比摒弃的内容还要多。从一定意义上说，当时理论批评的喧哗，正是刘、钟二人的批评著述博观约取、熔铸生发的资源，也正是二人理论批评巨作得以成就的条件。这个复杂的扬弃过程，给今天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警示和启发。的确，今天的理论很“多”，理论“喧哗说”就是对这一现象的贬义描述，指一部文学作品通常用多种理论学说都可以解释得通，但不知哪种理论的解说是“唯一正确的”，因此，理论虽“多”，但归根到底都是“无用的”。看来，“理论喧哗说”只是“理论无用论”的一个变体而已。事实上，这是人们试图直截了当地“用”理论时产生的幻觉，而不是反思批判地“做”理论时的清醒认识。只有在“零和游戏”的加法原则下，一人有所得必意味着他人有所失，“多”意味着“糟”。而在我们所处的“丰裕文化”时代，“多”意味着不“糟”。“批评的世纪”从多种多样的维度、视角和层面开掘了文学的属性特征，其中有些难免是“隅隙”意义上的理论，但它们既不能被排除于理论场域之外，也不可以一

个“糟”字了得，更不该以“无用论”或“喧哗说”轻易打发。因为，它们事实上已经成为今天理论思考的语境构成部分，我们必须正视它们，取熔自铸，才能达到理论的更新。

如果说 20 世纪是“正说”理论的理论学说“多”得让理论无用论者无所适从，那么，21 世纪则是“反说”理论的理论学说“多”得让理论无用论者欢呼雀跃。因为，他们终于从“反理论”和“后理论”的喧哗中，清晰地听到了理论的“死讯”。其实，特定理论的“死亡”并不意味着整个理论之死，宣告理论死亡也并不意味着理论事实上死亡。

理论不是单面的，而是多面的。多个面之间构成了一种“语义矩阵”。在这个意义上，理论“形式地”包容涵摄着“反理论”“元理论”和“后理论”；理论的意义正是在这些语义项所构成的语义矩阵要素之间振摆穿梭。即是说，在不同的语境中，理论这一术语具有“多价性”，因而是“家族相似的”，理论本身具有“综合性”。

在理论所生发的话语谱系中，理论与“反理论话语丛”之间形成“反义关系”，其间相互对立、对抗和否定。后者的特点是，它几乎在每一个观点和论述上，都与理论唱反调，反对“理论”几乎所有的观点、方法和假设，因而成为“理论”的颠倒的影像，是理论的“负模仿”。在这派理论中，有的偏于学理层面对理论的反反对，质疑特定理论的假设、前提和观念方法；有的则包含更强的意识形态内涵，强调的是对理论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观念的“反抗”和“抵制”。然而，“反理论”通常又不得不悖论式地以理论的形态存在并发生影响。因此，“反理论”通常表现为一种特殊形态的理论，并以反对和抵抗理论（其实是特定的理论）为其基本特点。

理论与“元理论”“亚理论”以及相应的“理论化”之间构成“蕴含关系”，后者尽管形式多样，但都为“理论”的存在进行合法性辩护，共同肯定理论的重要性和不可回避性。其中，“元理论”是最具内省性质的理论，它强调理论在研究其对象的同时，要对理论的前提假设、存在依据和运作方式进行反思和说明；也就是说，“元理论”其实是希冀拥有一个更具整全性的视角，以避免理论在研究其对象之时，忘记了对自身的反思批判（但元理

论研究并不必然否定和反对理论研究其对象)；“亚理论”则强调，在低于普遍性和概括化理论的层面，尚存在一系列对理论对象进行分门别类研究而获得的“亚”形态的理论，它们共同支撑着理论的大厦；“理论化”则强调，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研究都必然会涉及对研究对象的一定程度的概念化和概括化，因而，即使有人拒绝理论，但“理论化”却是不可回避的。这一簇理论话语，其根本旨趣不是否定理论，而是旨在通过各种努力以强化理论的自我意识、边界意识和反省意识。

理论与“后理论话语丛”之间形成“矛盾关系”。后者的特点是，它尽管与“理论”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但其间并不是单纯的“反义”关系，也不是单纯的蕴含关系，而是一种“非”的关系，即“理论非理论”。因此，“后理论”与理论之间存在着反讽式、悖论式的关联：它既抵制理论教条，也与理论教条联袂“平行”；既否认理论万能，又肯定理论的存在价值；既是理论的解构，也是理论的建构；既是“终结”理论，也是“追求”理论。这种关系将理论的全部不在场方面包容起来，既有整体性又有开放性，显示着理论构成的复杂性和多维性。这种关系中不断融会和生长着理论自身创新求变的契机和胚芽，同时也质疑反思特定理论活动的局限性和理论的普遍化所带来的自封僵化。与此同时，“后理论”与“反理论”之间构成“蕴含关系”，因此，“反理论”的洞见，会尽可能地融会在“后理论”之中，成为“后理论”的资源，因而又往往表现为对理论“盲视”的克服。

因此，“反理论”“元理论”和“后理论”是理论的题中之意，这些理论义项之间的变换，是理论在应对实践领域出现的具体问题时所进行的角色转换和功能调整。这不是理论的死亡，当然也不是理论无用论的证明，而毋宁是理论在“域化”“解域”和“化域”之间的辩证运动。

我们强调理论的包容性和多面性，并不是刻意为理论辩护，而是有着别样的理论旨趣。本书综合运用范式论、谱系学、解域理论和多元系统论等多种理论方法，以文学理论的“衢路”问题为核心，结合百年来文学理论的话语谱系、范式演替、符号矩阵和多元系统，阐发文学理论的通论体系，探索新世纪文论整合会通的可能途径。我们剖析“文学”理论、“大理论”与

“后理论”之间的“域化”“解域”与“化域”的辩证运动和往复生成；探讨“理论”“元理论”“反理论”与“后理论”之间或对立、或矛盾、或蕴含的语义矩阵关联；解析“文学创造—接受论”与“文学生产—消费论”子系统之间相互竞争又彼此依存、域化与解域的“文学多元系统”，进而对新世纪以来初现端倪的“文学商讨—阐连论”作了系统的论证阐发。我们通过文论话语的范式论和谱系学研究而展开“别异”，将各文论子系统之间的差异具体化、历史化到文学理论的各个要素环节，揭示其得失利钝；运用解域理论和多元系统论的观念方法而对文论话语进行“通和”，会通不同话语谱系和文论范式；在“别异”与“通和”相结合的视野下，建构和阐发具有通论性质的文学理论，进而对新世纪文学理论的生发空间和拓展途径做了尝试性的擘划和“图绘”。这种研究探索对于文艺学学科建设和观念创新当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然而，这些目标是否实现了呢？刘勰曾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自问自答地讨论了文学创作中从立意到成文过程难以避免的“打折”现象：“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其实，理论著述的写作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当我们要将理论观念“征实”于文学理论批评的史实而撰写理论著述时，我们也明显感觉到一次又一次的“折扣”或“折称”。本书大约也不免如此，但这不应该成为理论著述固步自封的托辞，而应该成为我们继续探索前行的动力和契机，敬祈专家和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目 录

序	1
导 论 理论的衢路、矩阵与化域	1
第一节 理论的“隅隙”与“衢路”	1
第二节 理论的“他者”与“矩阵”	7
第三节 理论的“解域”与“化域”	29
第一章 文学理论 / 大理论 / 后理论	37
第一节 文学理论的域化之罔	37
第二节 大理论的解域与再域化	45
第三节 后理论的化域和多元系统	59
第二章 文学语言 / 话语 / 述行论	83
第一节 文学语言论	87
第二节 文学话语论	111
第三节 文学述行论	125
第三章 文学纵向 / 横向 / 熔铸生发论	139
第一节 文学纵向发展论	139

第二节 文学横向生成论	153
第三节 文学熔铸生发论	162
第四章 文学创造 / 生产 / 商讨论	172
第一节 文学创造论	173
第二节 文学生产论	185
第三节 文学商讨论	201
第五章 文学作品 / 文本 / 事件论	213
第一节 文学作品论	214
第二节 文学文本论	231
第三节 文学事件论	248
第六章 文学接受 / 消费 / 阐连论	264
第一节 文学接受论	265
第二节 文学消费论	282
第三节 文学阐连论	297
第七章 文学批评 / 元批评 / 后批评论	316
第一节 文学批评论	319
第二节 文学元批评论	331
第三节 文学后批评论	342
结 语 文学理论的别异与通和	363
参考文献	369
后 记	376

导 论 理论的衢路、矩阵与化域

第一节 理论的“隅隙”与“衢路”

关于学问，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种境界”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①这是闻名天下的治学三境。这里有提出问题时的孤独与寻索，有分析问题时的坚忍与执著，也有解决问题后的轻松与喜悦。这种三重境界以问题的最终解决为学问历程的终点，因而为多数人所赞赏。

不过，这个境界说似乎缺失了问题得到暂时解决之后研究者所必然面对的自我质疑、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缺省了对研究者所采用的理论方法的审度和反省，也缺少了对研究本身的前提、条件、基础和假设的质询和究诘。而缺少的这一切，恰恰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理论批评研究不可或缺的环节，是理论批评最为重要和至为宝贵的自反性品质。这涉及文学研究“元理论”和“后理论”层面的问题。在我们看来，这种针对研究者自身和研究条件的质疑究诘、批判反思和解构重建，适可成为王国维先生学问三境之外的“第四境界”。这个境界的缺失，是导致特定研究结论被大写化、普

^① 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35 页。

遍化、非历史化和本质主义化的主要诱因。科学史家库恩的“范式”理论显示,即便是自然科学的“真理”,也在“范式转换”的历史进程中被不断质疑、拆解和重构,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真理性认识”则更是如此。

就文学理论的研究过程来说,研究者的心理活动、研究者与对象之间建立的关系以及研究者所采用的基本方法,都呈现出某种阶段性特征。加拿大文学理论家邦尼卡斯尔认为:“一个个体或一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都可能经历四个阶段,参与情感和整体构建方式的不同造成每个阶段差异的思想。简而言之,这些可以被称为情人、分析家、领导者和解构者等阶段。”^①按其理解,四个阶段在整体建构方式上大致对应于隐喻、转喻、提喻和讽喻。这种四阶段的对应关系可以图示如下:^②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恋爱对象	寻求理解	完整化和理想化	自由主义或幻灭
情人	分析家	领导者	解构家
隐喻	转喻	提喻	讽喻
命名事物	将相邻者	用各部分	认识到整体
学习名称	联系起来	建立整体	的不完整性

邦尼卡斯尔发现,在第一阶段,文学理论的研究者将研究对象视为恋爱对象,以对待情人的态度看待研究对象,通过隐喻思维方式给对象加以命名,并热衷于学习对象的名称。在第二阶段,研究者试图理解研究对象,以分析家的态度看待对象,通过转喻思维方式将对象与相邻事物联系起来,以考察对象的来龙去脉,观澜索源,振叶寻根。在第三阶段,研究者将研究对象各方面的特征综合起来并加以完整化和理想化,以领导者(即综观全局

① [加] 邦尼卡斯尔:《寻找权威——文学理论概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 页。

② [加] 邦尼卡斯尔:《寻找权威——文学理论概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8 页。

者)的态度看待研究对象,提喻式地将对象的各个部分构设为一个整体。在第四阶段,研究者面对自己建立起来的整体,或觉得自由,或感到幻灭,但无论属于哪一种,他都主要以解构家的态度来对待研究对象,讽喻式地揭示出,已然建立的整体是言意相背、杂乱无章的材料的积集,从而洞穿整体的“不完整性”,昭示出整体是如何被堆积建构起来的。

在这四阶段的学问历程中,最难做到的当属第四阶段。将自己孜孜矻矻建构起来的积木全盘推倒,或者至少是注意到整体中的裂隙、断层和缺省,并缘之将其拆解开来,从中自然也显示出了研究者超越常人的思想智慧。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研究者通过使整体坍塌解体和使理性秩序陷入荒诞境地的方式,展示其独特的真知灼见。然而,一般研究者要么不具备这样做的能力,要么缺乏这种自我解构的魄力,因此,通常会沉浸在已然建构起来的整体和大厦之中,享受问题得到暂时解决之后的轻松与喜悦。

将邦尼卡斯尔的“四重模式说”与王国维先生“三种境界说”两相对照,我们发现,除了二人都以“情人”喻说研究对象的某种有趣的巧合之外,其前三个阶段也有诸多相似之处,但王国维先生的境界说中则缺失了这至关重要的第四阶段。

当然,我们强调第四阶段至关重要,并不意味着其他三个阶段不重要。只是说,特就个体研究者的心路历程看,第四阶段才是一个解粘去缚的释然通脱境界。阿特金森指出:“完全成熟的民族志研究,需要一种对于自身的书写、对于语言的可能性与局限性的反身性意识,也需要一种对于再现模式的原则性探讨。我们不仅需要培养建构民族志文本的自我意识,更需要准备好以一种较为‘文学批判的’视野来阅读文本。”^①不过,从学术研究领域的常态分布来看,四个阶段和四种思维方式都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前三个阶段似乎恰恰是第四阶段的基础,只有有了那个建构起来的整体,才有解构的对象;在常规研究状态下,有的研究者主要以第一阶段的思维方式参与其

① [英] 安·格雷:《文化研究:民族志方法与生活文化》,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13 页。

中,有的则主要采取第二、第三或第四阶段的思维方式。只有这样,问题的更多层面和侧面才能彰显出来,理论领域才会多姿多彩,而学术研究的传统也才能得以赓续。

在文学理论研究领域,作为第四种方式主要特征的反思批判和自我质疑,应该渗透到各个阶段的研究中,使研究者在对待研究对象时,能有一个自我反思和自我质疑的空间,在研究问题和运用理论时保持一个反思的间距。从这个意义上说,邦尼卡斯尔对于四个“阶段”的截然区分就显得有些机械和生硬。不过,特别指出第四阶段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也应和着后现代文化质疑、反思和批判的基本品格。

理论场域需要有研究者情入式地投入其中,只有这样,理论的队伍才能源源不断地补充新生力量和新鲜血液,理论也才能得到持续发展;也需要有人不断开掘各种理论的来龙去脉和源流正变,只有这样,理论才能与其所自出的社会历史语境相关联而得到历史化和具体化;还需要有人不断地建构整体和框架,这样才能彰显出理论的综合概括能力,显示出理论学科高屋建瓴、宏观统照的独特魅力;当然更需要有人不懈地拆散理论的积木,解构理论的假设前提,反思理论的基础依据,这样才能使理论破除自封而不断发展。一个理论研究者在其学术生涯的某个时期可能以四种方式中的某一种为主导,但如果他能意识到尚有其他方式存在,意识到自己所采用的研究方式只是众多方式中的一种,而这种方式又有其自身的优势和不足,这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自我质疑和自我批判。理论家不妨是“机敏型的”(canny),善于在纷繁芜杂的对象面前迅速提取出“逻辑线索”和“理性秩序”,从而建构起理论的整体;理论家当然也可以是“盲乱型的”(uncanny),在使理论整体坍塌解体和理性秩序陷入荒诞境地的过程中展示自己机敏过人的真知灼见。^①

因此,面对“理论”,研究者既要反思自己所采用的理论的局限性,诚如王国维先生或许应该补充的“第四境”那样;也要意识到人们对待理论的

① [美]卡勒:《论解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立场态度所可能具备的多样化阶段特征，意识到研究者主要采用的是哪个阶段的态度立场，意识到这种态度立场本身的局限性，以及如何通过包容和兼取其他理论方式而克服自身的局限性。一句话，就是要破“执”，以免将自己所采用或偏爱的理论绝对化和普遍化，忘记了每一种理论在“去蔽”的同时也在“遮蔽”。换言之，理论要既能“照隅隙”，亦可“观衢路”。只有这样，对文学理论问题的阐释才能达到“独照”与“圆照”的相辅相成和互补互证。^①

“隅隙”和“衢路”是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使用的理论批评术语。刘勰认为，曹丕、曹植、陆机、挚虞等人的“近代”批评著述“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缘此而造成的后果是，或“密而不周”，或“辩而无当”，或“华而疏略”，或“巧而碎乱”，或“精而少功”，或“浅而寡要”；而其他影响更小的批评家和批评著述则更是“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诒，无益后生之虑”。可以看出，刘勰拒绝“照隅隙”式的批评，这种批评多囿于作家生平 and 作品篇章的一般论述，疏略碎乱、片面无当、少功寡要，是流于细枝末叶和表面现象的泛泛之论和“东向而望，不见西墙”^②的一隅之见；他真正追求的是“观衢路”的理论批评，这种批评寻根索源、原始要终、立论周密、逻辑谨严、功底扎实、议论精深，有益于研究的深化和问题的解决，对前人的研究也多有祖述，对后人研究则大有裨益，是对各个隅隙（包括衢路本身的阴影）的会通化解，因而也是理论批评的通途和大道。

看来，理论的“隅隙”就是理论在具体问题上的一得之见，当然也许不乏独特的解会，但在功用上却“无益后生之虑”；理论的“衢路”就是理论始终秉持的“圆照”视野和反省质疑精神，是对象反思与自我反思的同

① “独照”和“圆照”都是刘勰《文心雕龙》中的理论批评术语。“独照”见《文心雕龙·神思》，“圆照”见《文心雕龙·知音》。

② “会己则嗟讽，异我且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见《文心雕龙·知音》。

时并举；是对全方位、整全性视野的不懈追求，是整体与局部之间的辩证对话，是对各个“隅隙”的整合会通。“衢路”正是这样一个有利位置，诚如德里达的妙语：“如同有了新的视觉装置的辅助，人们最终可以看见视线，不仅看见自然风景、城市、桥梁和深渊，而且可以看见看本身。”^①“看”一般是用来观看对象的，对象或是城市，或是风景，或是文本，但却看不见“看”本身。换到文学研究上来，文学理论不仅要研究作为其对象的文学，还要研究和反思文学理论自身。而有意思的是，“理论”（theory）这个词，在希腊语词根上，就具有“看”的意思。研究者指出，从词源学上说，theory 与 theatre 具有同一词根 thea，即“看”的意思，在希腊语中，theoria 是一种“视线或景象”，这种字面义被隐喻式地用来指沉思或推测。^②因此，这种“新的视觉装置”其实即是 theory 的题中之意，它就是那种试图看见视线本身的“反思性”。德里达在这里形象地传达了理论的“反思性”要求，而这正是理论之“圆照”的闷机和枢纽。若丧失了这种“圆照”，理论就会从“衢路”滑入“隅隙”，顶多只能得“一隅之见”而未至“圆照”。理论的“圆照”之难，即在于思想在思想对象的同时，还需要反思性地思想本身。

理论走在其“衢路”上，就要随时随地留意理论的“母元”问题，并将各种“隅隙”意义上的一得之见整合关联于“母元”问题上。因此，理论的“问题意识”并不仅是“隅隙”意义上的“小问题”意识，而且是“衢路”意义上的“大问题”意识，是“圆照”意义上的全局性的问题意识。文学理论批评的根本功能，即是针对问题而讲道理，但道理每常有大小之分、真伪之别。“衢路”意义上的道理是“大道理”，“隅隙”意义上的道理是“小道理”。大而无当的道理是“伪道理”，小而不周的道理则可能是“错道理”。文学的“道理”自然是针对文学的“问题”而形成的；“大道理”针对的是大问题，“小道理”对应的是小问题。因此，泛泛讨论一般的小问题，并不

① Jaque Derrida, "The Principle of Reason: The University in the Eyes of Its Pupils", *Diacritics*, 13 (1983), 19.

② Tony Bennett, Lawrence Grossberg, Meaghan Morris (eds), *New Keywords: A Revised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5, p.347.

就意味着真正具备“问题意识”；对那些切中时代脉搏的大问题的意识，才算得上是真正的“问题意识”。面壁虚构出来的问题是“伪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意识是“伪问题意识”，缘此而讲出的道理，则必然是“伪道理”；来自实践（包括理论实践）的问题才是“真问题”，缘之而来的道理才是真道理，这种问题意识才是真正的“问题意识”。因此，“倾听实践呼声”依然是真正具有问题意识的前提和基础。^①

第二节 理论的“他者”与“矩阵”

“理论”当然是一个与“实践”相对的术语，在这个意义上，“实践”即是“理论”的“他者”（other）。因此，人们总是在“理论/实践”的在场/不在场关系中讨论理论问题。然而，从特定视野看，理论本身也是一种实践，是一种特殊的实践形式；在某些特殊情境下，“理论实践”甚至是比一般的实践更有力的实践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实践中的理论的“他者”，即是理论自身在“在场/不在场”的意义上与其他理论的关联性。也就是说，当人们使用“理论”这一术语时，也同时还在“或隐或显地与其他概念范畴相对比”^②，如“反理论”（anti-theory, against theory）、“元理论”（metatheory）、“软理论”（soft theory）、“后理论”（post-theory, after theory）、“亚理论”（subtheory, paratheory）、“复数小写理论”（theories）、“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理论化”（theorizing），等等。这种现象，是理论“他者化”或“他化”而派生出来的诸种“非”理论的重要形式，如何处理理论与其他理论之间的关系，就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理论本身的反思性品格看，这恰恰是当今的理论研究应该备加重视的内容。

① 陆贵山：《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创新》，《文学评论》2009年第4期。

② John Storey,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Pearson Longman Ltd, 2001, p.19.